

三大：张国焘落选三届中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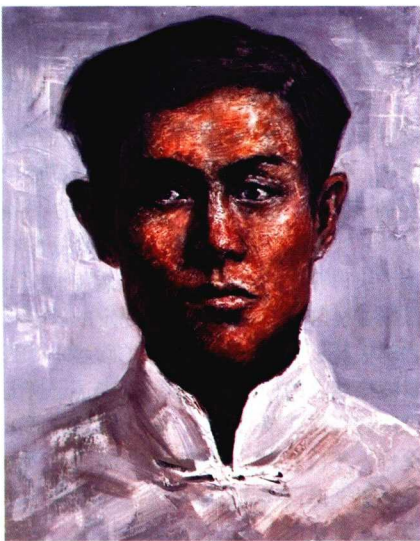
党的三大共选出14人组成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，但候补执行委员李汉俊从未到职，张连光不仅未到职，不久更携款潜逃。除去这两人外，实际上参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的是余下的12人。

第二届中央领导成员中的多数，如陈独秀、蔡和森、李大钊、李汉俊、邓中夏继续当选，而且陈独秀、蔡和森、李大钊都是选票最多的。高君宇则因北京区委的罗章龙、邓培当选而落选。

尤为引人注目的是，党的一、二大中央领导成员张国焘因为搞“小组织”活动、激烈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而落选。

同前两届相比，第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具有新的特点。

一是新成员居多。14人中有9名新成员，占64.3%；中央局5人中有3名新成员，占60%。本届成员平均年龄33岁，最大的是陈独秀，



44岁。最小的是项英，25岁。这些领导成员都是正当青壮年，年富力强，朝气蓬勃，热情

高，干劲足，思维敏捷，易于接受新鲜事物。

二是出身劳动家庭者居多，代表性广泛。实际担当工作的12位委员中，出身工农劳动家庭的8人，占66.7%。他们分别来自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、安源、唐山各区委地委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。他们对中国农村、城市、工厂、铁路、矿山等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，这非常有利于中央决策能够密切结合实际。

三是均经过实际斗争锻炼考验，具有四五年学运、工运、农运经历，任过党、团、工会的基层、中层、地区领导职务，有相当的工作经验。大多数理论思想水平高，组织领导能力强，政治坚定，斗争性强，作风深入，重视团结，善于联系群众。罗章龙便称：“‘三大’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，阵营颇为严整，工作效能亦高，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。”

四大代表忆趣事

四大代表郑超麟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中，讲述了四大会议过程中的一些趣事：

“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，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，当时是‘中国地界’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，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。”

“……会场设在二楼，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，有黑板，有讲台，有课桌课椅，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，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，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。我们都在后门出入，楼下客堂间怎样布置，我没有留下印象。会开后，工人部拿去这幢房子做甚么机关。”

“第一天开会，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，有人报告，杨殷被人打伤了。大会派人去调查和慰问，第二天杨殷来出席，头上包着纱布。”

“张崧年、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，张崧年站起来发言，反对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。大家很诧异，这是1923年第三次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，本次大会并无此议程。结果，瞿秋白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，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。他说，例如，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’的图章，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；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。”

“讨论问题时，李维汉发言很有重量，往往能起决定作用。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，叫做‘实力派’。”

“会后，在三楼宿舍闲谈时候，我听李维汉说：‘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，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？’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。”

天津代表李逸在《中共“四大”会议

琐记》一文中也有些回忆：

“各地代表中，住在会所者只有4人，即李维汉、尹宽、阮济和笔者。床是没有的，大家都席地而睡。李、尹是长人，所备棉被长度不够，他们和衣而睡，用毛围巾将头下端扎起。这样，才能在寒夜中保持足部温暖。”

“大会在各地区报告后，继之以讨论议案，通过一项宣言，决议案有政治问题、组织问题、宣传问题、民族革命运动、职工问题、农民问题、妇女运动、青年运动等决议案，大多是略经讨论即顺利通过。只有职工运动草案，原由项英起草，在大会中引起许多指摘；最后，项英承认自己是工人出身，文化水平低，以致起草的议案有许多缺陷。当场将原案收回，另行起草，在另一次会议中始获通过。”